

## ■ 學會介紹——人類學門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中國民族學會簡介

黃應貴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人類學門召集人

目前國內最主要也是唯一的人類學正式專業團體，便是中國民族學會。這個學會於 1934 年在南京成立，因一部份成員於 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台後，繼續參與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教學工作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使人類學於戰後在台灣得以開展。到了 1954 年 1 月 17 日，來台的民族學、考古學、民俗學、人類學等相關學者，共 46 人，在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會議室舉行中國民族學會「復會之成立大會暨第一次會員大會」，使得中國民族學會在台正式復會。在該次大會中，並決議編行《中國民族學報》。這份代表中國民族學會的正式學術刊物，共出版了三期：第一期於 1955 年 8 月出版，第二期於 1958 年 6 月出版，第三期於 1963 年 4 月出版。而這三期的論文大都是在學會年會中宣讀的學術研究論文。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民族學會確實是以學術活動為其主要的關懷。而論文的撰寫者，則主要包括了當時隨國民政府由大陸來台的相關學者，如李濟、凌純聲、何聯奎、芮逸夫、衛惠林等，以及他們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

年輕學生。他們努力的方向，正如第一期的發刊辭上清楚指明的，除了延續中國民族學會在大陸時期所努力要完成的「科學的中華民族之歷史」工作外，更注意到台灣本身的獨特性。如因「台灣東臨太平洋、西望東亞大陸，又位在亞洲地中海東緣綵花列島之中途，及中國東海與南海之交，位在水路十字路口，古代海洋與大陸兩文化的交流，台灣為常經之路。....在學術上，此不僅為東南亞民族學之寶庫，同時亦為中國遠古史之活史料，再進一步言，有為環太平洋若干文化起源於亞洲之有力論證」。是以，中國民族學會所發行的三期《中國民族學報》，正好見證了民國初年大陸人類學南派研究在台灣復興的復興。這期間，他們除了積極地從事台灣地區的民族學調查外，還翻譯了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所印的《人類學調查手冊》，以利教學及訓練學生從事調查工作。另外還印刷發行了民族學文獻小叢鈔，包括《蔡元培先生民族學論著》及劉師培的《中國民族志》等。因此，由 1954 年到 1963 年的十年間，是中國民族學會第一年由大陸來台的學者最為活躍的極盛

期。

到了 1965 年以後，以《中國民族學會通訊》取代了原有的《中國民族學報》，不再以學術研究論文的出版為主，而以「評論」、「書評」、以及「學術活動消息」為主，也使得中國民族學會的角色由積極推動學術研究轉為學術交流與溝通的組織與場所。而評論論文的主要撰寫者，也漸由從大陸來台的老學者轉到他們所訓練出來的第一代學生上，如李亦園、唐美君、宋文薰、王崧興、王人英、謝繼昌等。雖然，學會的主導權仍然握在老一輩學者的手上，不過 1965 年到 1971 年，可說是《中國民族學通訊》最有活力的時期。這期間，最多每年可出到三期的通訊。但在 1972 年未能準時出刊後，1974-1976 年，以及 1978 年、1980-1981 等年，均未能出刊。這正說明了這段期間，中國民族學會的活動日漸沒落，而有著青黃不接的現象。這與從大陸來台作為學會領導者的老一輩學者因病或凋零（如李濟、凌純聲、芮逸夫等教授先後過世）直接影響到學會的活動頻率，而下一代還未能正式接掌學會的領導權有關。

1982 年，李亦園先生接掌中國民族學會理事長開始，學會有了另一個階段的發展。這除了表示年輕一代學者完全

取代了老一輩學者對於台灣人類學發展的主導權外，其學會活動方向與方式仍具體表現於《中國民族學通訊》上。雖然，表面上，該通訊形式沒有變，但已由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的學術討論取代了原先的學術評論。舉例來說，由 1982 年到 1986 年間第 17 期到第 25 期的九期通訊中，有六期的研究專號，如第 17 期的「人類學的實用性」、第 18 期的「人類學的教育與未來」、第 19 期的「台灣地方史料的發掘與應用」、第 21 期的「鄉村社區生活」、第 22 期的「慶祝石璋如教授八秩壽慶」，以及第 23 期的「民間宗教儀式之檢討」等專號，大都是舉行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的成果而來。這正呈現中國民族學會在凝聚該專業學術團體成員的方式及推動學術活動上的活力。

事實上，1982-1986 年也是中國民族學會成立至今，舉辦活動最多的時期。比如，1982 年 1 月 17 日舉辦了「台中同姓村落之旅」，3 月 28-29 兩日舉行了「宗教之旅」，6 月 20 日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辦了「人類學的教育與未來」座談會，10 月 3 日舉辦了「桃園縣祠堂、同姓聚落之旅」；1983 年 5 月 20 日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辦了「台灣地方史料的發掘與應用」研討會，6 月與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編印了《光復以來台灣地區出版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人類學論著目錄》；1984年2月18-19兩日舉辦了「鄉村社區生活旅遊及座談會」，3月31日與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合辦了第二次「台灣地方史料的發掘與應用」座談會；1984年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合辦了「中國的民族、文化與社會」的系列講座，以便向社會大作推廣人類學觀念與研究成果；1985年4月14日，與「思語言」雜誌社合辦了「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1985年5月11-12兩日，與台灣省政府合辦了「民間宗教儀式之檢討」學術研討會；1986年6月12-30日，與台灣省立博物館及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在台灣省立博物館舉辦了「東南亞文物特展」等。這些活動對於人類學專業研究的影響較不明顯，但對於社會大眾推廣人類學學科知識的作用卻不小，且對凝聚會員的向心力更有其一定的功能。

不過，通訊到了1987、1988兩年未能繼續出刊，也反映了該學會到了另一個轉折點：一方面因1987年台灣社會解嚴之後學術研究課題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學術研究教學單位的增加，以及地方及各級政府單位自行舉辦各種相關活動（如宜蘭縣政府舉辦考古人才訓練營或各級文獻會舉辦相關的宗教或地方文獻資料的活動），均使得原先學會活動方式與活動內容受到了考驗。因此，

雖然在1989年出版了第26期通訊，但1992年又未能出刊。之後，1993年雖繼續出刊，但理事長已由上述來台老學者在台訓練的第一代學生的學生莊英章先生接掌，進入第三代領導台灣人類學界發展的階段。然而這時整個台灣人類學界發展的多元化，以及新的教學研究單位（特別是博物館）又不斷出現，再加上學會本身在活動方式與內容方面，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也使得學會本身的號召力日益衰弱。所以，從1993到1999年之間，通訊雖仍正常出刊，但學會活動卻日益萎縮。比如，在1990年2月2日，學會還舉辦了「空間問題」與「文化資產」兩個問題的學術研討會；1992年12月21-23日與台灣省立博物館合辦了「人類學與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年9月18-19兩日舉辦了「台中外埔農村民俗之旅」；1994年通訊出了「澎湖島的人類學研究專號」等類似上一階段的活動。此外，甚至還透過學會向教育部爭取文化人類學列入相關科系的必修科目，以及從事大陸及海外田野工作的經費，均有具體且很實際的結果。但很明顯地，相對於1982-1986年時期，整個學會的活動確實萎縮了不少，這自然導致會員參與學會活動的熱誠更益衰減。這個問題更因學會一開始就廣義地涵蓋了與人類學有關的各種其他相關學科或研究的人員，使得會員的共識不易獲得。再加上人類

學各分支領域的專業發展，也使得不同分支領域的人員間，對話也愈來愈不容易。比如，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者與從事者之間，即使在同一個單位，平常都不易有良好的溝通。在這情況下，學會的活動要能獲得共識與參與，確實是愈來愈難。對於現階段學會的理事長而言，真的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到 1999 年出了第 37 期通訊之後，至今未再出刊。這個現象代表著台灣人類學界的唯一正式專業學術團體，正面臨了去留的困境。誠如目前國內人類學界的年輕學者及學生，大半不知有中國民族學會的存在一樣，若不能改變其活動的內容及方式，以吸引年輕一輩的學者、老師、以及學生的注意與參與，它

走入歷史將是遲早的事。但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缺少一個學術專業團體的存在，勢必使得研究課題日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協調各教學研究單位的工作更加困難，也使得學術研究與教學上的合作與互補也不易進行，更不用說如何合作發展並尋求台灣人類學界未來可發展的研究課題與方向。如此，也使人類學界少了一個可以正式爭取權益及代為發言的職業團體。是以，如何改革目前的中國民族學會或重新組織一個能有效運作的專業人類學學術團體，應是國內人類學界的急迫工作之一。然而，這樣的組織，到底是以專業標準來考量入會者的資格？還是較鬆懈地涵蓋所有相關研究而願意加入者？對於像人類學這類人數少的小學科而言，便是一開始就要面對而難以決定的首要困境。